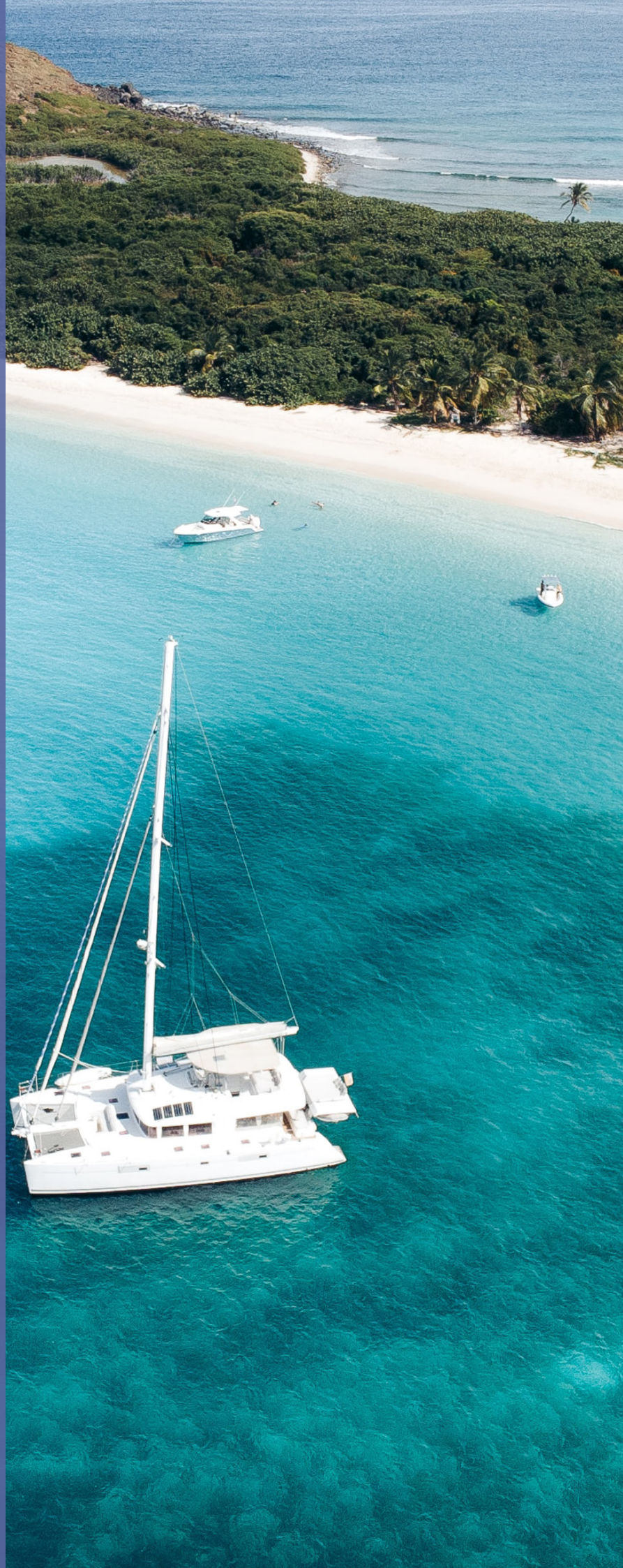


全球非传统安全观察



2023年3月上旬刊
总第58期

中国非传统安全论坛秘书处
圣皮耶国际安全中心

编者语

欢迎来到新一期的《全球非传统安全观察》杂志，本期刊物将为您带来针对最紧迫非传统安全挑战的分析见解。当下，推动非传统安全领域的开放讨论，吸取多样化的观点和经验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重要。

世界经济论坛的《2023年全球风险报告》称，俄乌战争继续“严重”影响全球农业化肥的供应，可能会破坏全世界的粮食安全。该报告将迫在眉睫的粮食供应危机列为当前世界面临的四大威胁之一，并预测“化肥价格飙升的滞后效应”将打击今年全球的粮食生产。

在第五次联合国最不发达国家问题会议上，发言人强调，世界上没有可以预防气候变化

何灾害发生的疫苗。他们呼吁采取紧急行动，以支援“脆弱”国家，因为“现在”已经不再“为时尚早”了。斯洛文尼亚总统娜塔莎·皮尔茨·穆萨尔在开幕词中表示，气候变化不仅仅是一个人类安全问题，而且是一个重大的国际安全问题。没有一个国家可以幸免，但最不发达国家受害最深。

欧盟委员会和高级代表近期通过了一份关于加强欧盟海洋安全战略的联合公报，以确保和平利用海洋，并保障海洋领域免受新威胁。他们还通过了一项最新行动计划，以促进战略落实。欧盟有意调用它所掌握的一切工具，保障民事和军事两个层面上的海洋安全。

加拿大安全情报局 (CSIS)

最新发布的一份分析报告警示称，气候变化对国家安全和繁荣构成了深刻的、持续的威胁，比如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和临近大西洋的部分省份可能会因海平面上升而丧失部分领土。报告还预见到，未来在希望加速解决气候变化问题的人群以及更倾向于维护现有生活方式的人群中，可能会出现更多的意识形态层面的暴力极端主义。

我们衷心希望这期刊物能够带给您启发，也期待您的反馈。如果您感兴趣，请加入我们在 www.spcis.org 的邮件列表，并在 LinkedIn 上关注我们。

2023年3月15日
圣皮耶国际安全中心
刊物编辑部

目录

01	智库追踪 THINK-TANK TRACKING	11
02	前沿研究 FRONTIER RESEARCH	16
	土著环境视角：挑战海洋安全状态	16
	外国恐怖主义战斗人员概念的内在批评	17
03	学者访谈 SCHOLARS INTERVIEW	18
	Mélanie Juza：更为频发的海洋热浪将愈影响野生动物、渔业及人们的生活（尤其在地中海）	18
	David Welch：反思安全——对冲突解决和管理的文化理解	20
04	研究员专栏 RESEARCH COLUMN	22
	刘国柱：数字标准的地缘政治论析——基于大国竞争的视角	22
05	中亚专栏 CENTRAL ASIA COLUMN	37
	Diana Toimbek：哈萨克斯坦的能源安全及其影响	37

学术委员会



余潇枫

主席

非传统安全理论专家

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导

浙江大学非传统安全与和平发展研究中心主任



魏志江

委员

非传统安全理论专家

中山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博导

《中国非传统安全研究报告》主编

南京大学历史系博士



冯长根

委员

科技安全专家

中国科协原副主席

国际欧亚科学院院士

利兹大学物理化学系博士



余翔

委员

知识产权专家

欧洲科学院院士

华中科技大学二级教授、博导

湖北师范大学副校长

管理学博士



徐晓林

委员

非传统安全治理专家

湖南农业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特聘教授

原华中科技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

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公共管理学科评议

组专家



黄建钢

委员

海洋安全专家

浙江省社科二级教授

浙海大浙江舟山群岛新区研究中心

(CZZC) 首席专家

北京大学政治学博士



陈斌

委员

中国非传统安全论坛秘书长

圣皮耶国际安全中心主任

广东印太和平与发展研究院副院长

暨南大学国际关系学博士

顾问团队



Ritu Agarwal
经济安全专家
尼赫鲁大学国际研究院东亚研究中心副教授
德里大学政治科学系博士



Keven E. Bermudez
国际人道主义救援专家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顾问、“好邻居”组织创始人
医学博士



高剑波
信息安全专家
北京师范大学地理学部教授、博导
UCLA 电子信息工程博士



胡靖
粮食安全专家
华南师范大学教授
“三农”与城镇化研究所所长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博士



Mohd. Aminul Karim
区域安全合作专家
孟加拉国独立大学商学院教授
国际政治科学协会会员
印度达卡大学博士



刘国柱
非传统安全理论专家
浙江大学世界史所教授、博导
浙江大学非传统安全研究中心研究员
南开大学历史学博士



Yannis A. Phillis
产业安全专家
克里特科技大学校长
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动态系统控制博士



谌新民
人口安全专家
华南师范大学经管学院教授
广东省人民政府省长决策顾问专家
暨南大学经济学博士



成锡忠
海外利益保护专家
西南政法大学非传统安全研究所特聘教授
北京中安华盾咨询服务有限公司常务顾问
西南民族大学国家民委东南亚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



Chris Hadley
社会安全专家
浙江大学非传统安全管理专业博士



何一平
经济安全专家
广东国际经济协会原执行会长
广东省政协经济委原副主任
广东省广业集团有限公司原董事长



李晓峰
经济安全专家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经贸学院教授
博士与博士后导师
复旦大学博士后



林坚
文化安全专家
人大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
社会系统工程研究中心主任
中国人民大学哲学博士



Filippus Proedrou
能源安全专家
南威尔士大学研究员
色雷斯民主大学能源学博士



Jeffrey Reeves
文化安全专家
加拿大亚太基金会副总裁
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国际关系专业博士



Syed Hussain Shaheed Soherwordi
恐怖主义问题专家
白沙瓦大学国际关系系主任，教授
爱丁堡大学博士



Kate Tulenko
公共卫生安全专家
Corvus 医学咨询公司首席执行官兼创始人
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医学院医学博士



Johannes Urpelainen
能源安全专家
约翰霍普金斯大学 SAIS 教授
密歇根大学政治学博士



Vlado Vivoda
能源安全专家
昆士兰大学可持续矿产研究院研究员
弗林德斯大学国际关系博士



余乃忠
《全球非传统安全观察》特约编辑
长沙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中国人民大学哲学博士



于铁军
国际安全理论专家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国家安全学系主任，教授
北京大学国际安全与和平研究中心主任
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院副院长
北京大学国际政治专业博士



姚羽
网络安全专家
东北大学教授，博导
国家重点研发计划会评专家
国家 863 高科技计划会评专家
东北大学计算机学院博士



张金生
贸易安全专家
深圳市世贸组织事务中心原主任
中国社会科学院高级研究员
经济学博士、高级经济师



赵英
产业安全专家
中国社科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原主任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教授



周树伟
社会安全专家
广东国际经济协会高端智库专家
广东省人民政府参事室特约研究员
广东省商务厅原副巡视员



朱新光
社会安全专家
上海师范大学哲学与法政学院教授
东南亚研究中心主任
南京大学国际关系专业博士

研究员团队



艾尚乐
金融安全研究员
暨南大学国际关系学博士
暨南大学应用经济学博士后



程永林
金融安全高级研究员
广外广东国际战略研究院教授
暨南大学国际关系学博士
复旦大学金融学博士后



樊守政
恐怖主义问题高级研究员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副教授
南京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博士候选人



侯颖
社会安全研究员
暨南大学博士后
澳门大学国际关系学博士



晋继勇
公共卫生安全高级研究员
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
教授、副院长、博导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博士
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博士后



Ilan Kelman
风险与减灾研究员
剑桥大学哲学博士
伦敦大学风险与减灾研究所教授



李佳
文化安全研究员
浙江大学外国语言文化与国际交流学院
副教授
浙江大学管理学博士



陈永品
非传统安全治理研究员
广州开发区人才工作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
中国科学院环境科学博士



陈玉梅
网络安全高级研究员
电子高级工程师
暨南大学政务大数据开放与社会创新创业
研究中心主任、博导
澳门科技大学管理学博士



侯建雄
海外利益保护特聘研究员
广东国际经济协会常务副会长
广东世能电力设备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
广东省重大行政决策咨询论证专家



黄永弟
“一带一路”非传统安全风险研究员
广东金融学院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
广东金融学院粤港澳大湾区城市治理研
究所所长



Irfan Ullah Khan
人口安全研究员
浙江大学国际关系专业硕士
浙江大学非传统安全管理专业博士候选人



李方芳
全球健康与可持续发展研究员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全球健康外交顾问
阿姆斯特丹大学和巴塞罗那国际健康研
究所双博士



李乾
海洋安全助理研究员
中山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博士候选人



廖丹子
非传统安全理论高级研究员
浙江省数字安防与非传统安全研究院特邀研究员
浙江大学非传统安全管理专业博士



刘凤元
金融安全高级研究员
华东政法大学资本市场研究中心主任
国际金融法律学院教授



刘金山
经济安全高级研究员
暨南大学投资咨询（研究）中心主任
经济学院教授、博导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博士



刘天阳
非传统安全治理研究员
武汉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副研究员
澳大利亚墨尔本大学哲学博士



刘元玲
气候安全高级研究员
中国社科院美国研究所美国经济研究室助理研究员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博士



卢矜灵
东南亚地区安全研究员
广西民族大学东盟学院越南语信息员



麦方
财政安全高级研究员
广东省人大常委会立法咨询专家



Bakirov Maksatbek
中亚地区安全研究员
吉尔吉斯奥什国立大学硕士
浙江大学非传统安全管理专业博士



莫有恒
海洋安全助理研究员
武汉大学国际法学博士候选人



覃胜勇
公共卫生安全高级研究员
中山大学医学国际合作办公室主任
暨南大学国际关系学博士



Imran Ali Sandano
非传统安全理论研究员
巴基斯坦信德大学国际关系学助理教授
浙江大学非传统安全管理专业博士



Luis L. Schenoni
拉美安全研究特邀研究员
伦敦大学学院安全研究助理教授
圣母大学政治学博士



汤取安
海外利益保护特聘研究员
中城卫保安集团原国际部副总经理
国际注册信息系统安全专家（CISSP）
中国国家注册高级保卫师



Diana Toimbek
非传统安全理论研究员
哈萨克斯坦国际研究实验室高级专家
浙江大学非传统安全管理专业博士



王冕兴

社会安全研究员
广东省惠州市府办政策研究员
暨南大学国际关系学博士



王新和

北极问题高级研究员
青岛市社会科学院国际问题研究所副研究员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博士



王卓

社会安全高级研究员
四川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首席专家
中国西部反贫困研究中心主任
西南财经大学法学博士



谢法浩

社会安全研究员
暨南大学应用经济学博士后
暨南大学国际关系学博士



谢贵平

边疆安全治理高级研究员
国家社科重大招标项目首席专家
浙江大学中国西部发展研究院教授、博导
浙江大学非传统安全管理专业博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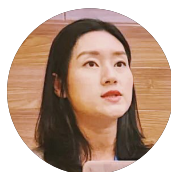
许涛

中亚地区安全高级研究员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中亚研究室主任
研究员、博导
莫斯科国立大学博士



张建华

贸易安全助理研究员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经贸学院博士生



章雅荻

移民治理方向研究员
重庆大学新闻学院讲师
浙江大学非传统安全管理专业博士



赵欣

海外利益保护特聘研究员
广东信良兆诚律师事务所主任
广东法学律师研究会副会长



郑先武

区域合作安全高级研究员
南京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副院长、教授、博导
南京大学国际关系史博士



周龙

人口安全研究员
广外国际关系学院外交系主任
暨南大学国际关系学博士



周木亮

经济安全高级研究员
广州商务局国际招商处处长



钟晓君

经济安全研究员
广东技术师范大学副教授，硕士生导师
财经学院商务系主任，产业经济研究所所长
暨南大学经济学院经济学博士



周燕萍

贸易安全助理研究员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经贸学院博士生



周章贵

资源安全高级研究员
浙江大学非传统安全与和平发展研究中心国际水资源安全研究所所长
浙江大学非传统安全管理专业博士



邹冠炀

公共卫生安全高级研究员
广州中医药大学教授
英国爱丁堡玛格丽特女王大学博士

1 智库追踪

巴基斯坦的童婚：与维权人士的对话

■ 文化安全：人权问题

Mahnaz Shujrah, IDS 研究员。

巴基斯坦的童婚是一个多方面的问題，包括不同的法律层面和根深蒂固的社会文化规范。根据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数据，巴基斯坦整体童婚率在世界排名第六。2013 年，信德省通过立法，将 18 岁定为法定结婚年龄，截至目前，该省仍然为巴基斯坦唯一有该法律的省。在该国的其他地区，法定婚姻年龄仍然为 16 岁。尽管在法律上规定 16 岁为合法婚育年龄，但是巴基斯坦社会上很少有人遵守该法律，因为在伊斯兰教法中，任何进入青春期的女性都可以结婚。除此之外，在

关于童婚问题的判例中，巴基斯坦法院在判决过程中依然倾向于伊斯兰教法，巴基斯坦童婚问题始终无法得到妥善解决。童婚问题是一个无可置疑的人权问题，年轻女孩多遭受外部压迫而不得不极早婚育，这对于女孩的身心健康造成了极大危害。巴基斯坦的童婚问题亟待解决，其女性权利仍然需要进一步维护。

来源：

Child marriage in Pskistan: Conversations with activists | IDS | [https://www.ids.ac.uk/opinions/child-marriage-in-pakistan-conversations-with-activists/\(2023-3-8\)](https://www.ids.ac.uk/opinions/child-marriage-in-pakistan-conversations-with-activists/(2023-3-8))

不再有“用户须知”：重写美国政府和私营部门之间的网络安全协议

■ 信息安全：数据安全

Mary Brooks, 威尔逊中心网络安全研究员。

约 15 年前，时任美国总统奥巴马发表演讲，表明私营企业有责任承担大部分美国网络安全的保障工作。但近日随着国际网络安全战略出台，拜登认为私营企业对美国网络安全不再有意义。这是私营企业首次被要求达到最低的网络安全标准的时刻，同时美国政府也将加强破坏世界网络犯罪，保护美国人免受网络攻击。目前的网络安全战略愿景

还未能完全成为现实，但无论未来的进度如何，新的国家网络安全战略是规划政府和私营企业之间的新关系的重要一步。

来源：

No More “User Beware”：Rewriting the Cybersecurity Pact Between the US Government and Private Sector | Wilson Center | <https://www.wilsoncenter.org/blog-post/no-more-user-beware-rewriting-cybersecurity-pact-between-us-government-and-private-sector>

禁止碳燃料和合成产品将如何损害环境

生态安全：环境安全

Pierre Desrochers, 弗雷泽研究所高级研究员。

加拿大许多政治家都致力于推动他们的选民实现“净零”(或碳中和)目标,该目标将通过万物电气化来实现,包括风能及太阳能光伏发电、运输和建筑部门的重大转变、居民整体日常消费的减少以及各种渐进式改进,以提高能源利用效率,更好的完成碳中和目标。为尽力实现该目标,许多环保学家和政治家将化石燃料的合成产品妖魔化,加拿大政府致力于指导企业和组织摆脱“问题塑料”的任务,以减少污染并支持创建循环经济。但是实际上,加拿大人与其他发达经济体居民一样,很少向生态系统释放此类物质。毋庸置疑,碳燃料广泛运用于机

械、钢铁和水泥生产、复合材料、运输、安装等生产活动过程,而且目前暂时未寻找到合适的替代品。若盲目“净零”,将会导致对生物和其他物质,例如木材、棉花、羊毛等材料的需求增加,对于生态环境的影响更大。因此,实现净零排放目标需要循序渐进,否则将进一步恶化生态环境。

来源:

How Banning Carbon Fuels and Synthetic Products Will Hurt the Environment [Fraser Institute]
[https://www.fraserinstitute.org/studies/how-banning-carbon-fuels-and-synthetic-products-will-hurt-the-environment\(2023-3-10\)](https://www.fraserinstitute.org/studies/how-banning-carbon-fuels-and-synthetic-products-will-hurt-the-environment(2023-3-10))

打破“多重危机”与贫困之间的联系

社会安全：贫富极化

Vidya Diwakar, 发展研究所政策研究员。

“多重危机”包括冲突、灾难和极端贫困等,主要集中在中低收入国家。由于当今多重危机的复杂性和多层次性意味着世界对消除贫困的努力做出系统性的改变,决策者需要制定长期的解决方案,同时应对多种危机。世界粮食计划署给世界提供应对多重危机的成功经验:应对新冠疫情的行动计划定期更新,考虑不断变化的分层危机,支持先发制人的行动,扩大直

接粮食援助,加强安全网络。因此,为了预测和解决系统性风险,政府、社会和国际组织需要进行多边合作,打破多重危机和贫困之间的联系。

来源:

Breaking the link between 'polycrisis' and poverty | Institute of Development Studies | <https://www.ids.ac.uk/opinions/breaking-the-link-between-polycrisis-and-poverty/>

太阳能地球工程：媒体披露的第二项经验

生态安全：气候变化

Marine de Guglielmo Weber, IRIS 气候, 能源和安全计划研究员。

2022 年 9 月英国举行了太阳能地球工程实验。太阳能地球工程实验, 也被称为太阳辐射管理, 该研究致力于通过增加反射回太空的阳光比例来缓解全球气候变暖, 而忽视减少大气中的温室气体。研究最多的技术是将二氧化硫喷洒到平流层, 这种技术旨在模仿大型火山喷发后的冷却效果, 但是这种技术目前极受争议。最近, 该研究同样在美国被实验, 进行该实验的美国初创公司以“冷却积分”为借口, 允许个人为气溶胶提供资金, 但是这些行动遭到墨西哥政府、大气科学和太阳能地球工程研究界的一致谴责, 因为美国初创公司的行为实践将该实验推向商业化, 这是不利于应对全球气候变

化的。在太阳能地球工程实验中必须保持警惕, 一方面, 目前仍然缺乏太阳能地球工程的法律框架, 以及该工程在媒体上的知名度较低, 这些实验试图保密进行以逃避争议。另一方面, 对于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政府直接资助太阳能地球工程研究的国家来说, 实验缺乏透明度的风险更大。事实上, 直到最近, 太阳能地球工程仍然处于数值建模阶段, 对该工程的研究和实验仍然需要进一步实践。

来源:

Géo-ingénierie solaire : une deuxième expérience révélée par la presse | IRIS

[https://www.iris-france.org/174245-geo-ingenierie-solaire-une-deuxieme-experience-revelee-par-la-presse/\(2023-3-7\)](https://www.iris-france.org/174245-geo-ingenierie-solaire-une-deuxieme-experience-revelee-par-la-presse/(2023-3-7))

约 70% 的孕妇死亡发生在撒哈拉以南

社会安全：公共卫生安全

Mark A. Green, 威尔逊中心全球发展研究员。

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对孕妇健康水平的目标是: 到 2030 年将全球孕妇死亡人数降低到 0.07% 以下。但最近的趋势表明, 如果世界要接近实现这一目标, 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近日联合国数据统计, 孕妇死亡仍然集中在世界上最贫穷、最缺乏医疗服务的地区。在所有的孕妇死亡案例中, 约有 70% 位于撒哈拉以南的非

洲地区, 如果在经历冲突的国家中, 孕妇死亡率更高。其中大多数案例在很大程度上可以通过高质量医疗保健来预防。

来源:

Approximately 70 Percent of All Maternal Deaths Occur in Sub-Saharan Africa | Wilson Center

<https://www.wilsoncenter.org/blog-post/approximately-70-percent-all-maternal-deaths-occur-sub-saharan-africa>

冲突后的乌克兰能源市场

资源安全：能源安全

Andrian Prokip, 威尔逊中心能源研究员。

天然气部门是受俄乌冲突影响的关键部门。2016 年，乌克兰国家天然气公司被拆分，新公司一部分将采取私有制，计划实现市场自由化。但是自由化的天然气市场价格并没有持续多久。2021 年初，在家用天然气价格急剧上升到与市场价格相匹配后，政府再次对家用价格进行了几个月的管制。但鉴于乌克兰有加入欧盟的愿望，俄乌冲突后乌克兰将必须修改其能源政策和市场以符合欧洲的原则。冲突后

的乌克兰市场效率低下、缺乏灵活性以及利润和亏损账目模糊不清，因此乌克兰国家天然气公司作为结构性混乱的典型代表，未来不应该再回到它的旧状态，以便公司在冲突结束后能迅速恢复正常运行。

来源：

Ukraine's Gas Market after the War | Wilson Center | <https://www.wilsoncenter.org/blog-post/ukraines-gas-market-after-war>

世界野生动物日：为什么需要更多合作伙伴关系

生物安全：保护生物多样性

Lauren Young, 皇家国防安全联合军种研究所野生动物保护研究员。

今年世界野生动植物日的主题为“保护野生动物的合作伙伴关系”。这个主题警示人们：面临物种逐渐灭绝和打击野生动物犯罪的情况下，迫切需要建立和维护合作伙伴关系。物种灭绝和生物多样性减少不仅是环境问题，还是对人类安全的最大威胁之一。因此，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 (CITES) 需要体现其重要功能，作为建立关键合作伙伴关系的桥梁，实现小规模共同合作的野生动物保护工作。在

宏观层面，世界需要新的联盟来保护更广泛的濒危物种和珍稀的自然资源；在微观层面，各国需要促进与当地社区维持安全和执法能力建设。总的来说，建立并维持合作伙伴关系将是至关重要。

来源：

World Wildlife Day: Why More Partnerships are Needed | RUSI | <https://rusi.org/explore-our-research/publications/commentary/world-wildlife-day-why-more-partnerships-are-needed>

英国加强科技与国家安全的联系

科技安全：芯片

Joseph Jarnecki, 皇家国防安全联合军种研究所网络安全研究员;
Pia Hüscher, 皇家国防安全联合军种研究所网络及国家安全研究员。

只要国家安全在其议程中发挥主导作用，政府设立科学、创新和技术部门 (DSIT) 就会受欢迎。英国首相苏纳克表示 DSIT 的建立标志着解决国际技术威胁迈出了重要一步。在部门建立的过程中，国家安全占据了主导地位。新冠疫情和俄乌冲突体现了英国对国际供应链的依赖，DSIT 必须交付政府期待的国家半导体战略成果。在国际标准方面，DSIT 应该倾向于参与制订国际标准，通过国际视野来推进其五个未来关键技术发展——人工智能、量子、

生物工程、未来电信和半导体，以及生命科学和绿色技术。虽然 DSIT 还处于早期阶段，但最重要的是，其应立即在科技和国家安全之间建立起决定性的联系。

来源:

Strengthening the Link Between Technology and UK National Security | RUSI
<https://rusi.org/explore-our-research/publications/commentary/strengthening-link-between-technology-and-uk-national-security>

阻止通货膨胀永久化

经济安全：通货膨胀率长期过高

Peter St Onge, 美国传统基金会经济研究员。

在拜登宣布战胜通货膨胀的几周后，商品价格又开始上涨，其中一月份的通胀率远超预期。在高通胀的压力下，部分左派学者希望推动通货膨胀永久化，他们认为政府应该按照政客的心愿印钞，只须让普通民众解决通货膨胀问题。这个想法意味着美国可以在绿色新政和大众福利等议题上大肆挥霍。但是，永久性通货膨胀会对储蓄者和投资者产生巨大冲击，它会耗尽美国储蓄，把工厂赶到海外，并使美国

失去了维持繁荣所需的资本。总的来说，永久性通货膨胀不仅会削弱美元作为全球储备货币的地位，还会削弱了美国实力和主导地位。参议员们认为参议院有责任采取审慎政策，阻止永久性通货膨胀和无尽赤字。

来源:

Thwarting the Push To Make Inflation Permanent | Heritage Foundation
<https://www.heritage.org/markets-and-finance/commentary/thwarting-the-push-make-inflation-permanent>

2 前沿研究

土著环境视角：挑战海洋安全状态

Tiara R. Na'puti and Sylvia C. Frain

近年关于美国的海洋安全状态话题受到广泛关注，本文将以太著认识论为中心，批评美国这种军事化和不合规的保护方式。

本文首先引入大洋洲土著的观点，从海洋空间层面的抵抗和变化聚焦认识。这些认识论为对大洋洲殖民地理想象的批评提供了分析分量和细微差别，并提供了抵抗美国军国主义的例子。文章通过研究海洋安全状态的案例，揭示了军国主义结构的裂缝和陷阱，以及对大洋洲海洋的“过度保护”现象。

土著海洋观念将水与陆地的关系理论化，海洋被理解为连接岛屿的路径，而不是分隔景观或地区的分割线。然而美国不断在大洋洲加强殖民控制和军事化大大损害了海洋安全状态。

本文强调，美国以民族国家视角划定和控制海洋空间，以继续通过世界上最大的专属经济区（EEZ）的联邦和商业管辖区维持经济主导地位持续挑战着海洋安全状态。此外，美国还在海洋中建立大量军事机构进行事实上的军

事占领，通过破坏海洋安全加强其在陆地层面的威权地位。

本文运用来自大洋洲的土著认识论提供了替代的概念框架，为对保护海洋安全和边境水域提供了信息。军事污染的影响无法在看似静止的海洋区域内得到遏制或控制，文章分析表明，要集中土著观点并在安全研究中突出其作用。驾驭帝国主义潮流需要抵抗和复原力的战略，进一步加强海洋认识论，保护海洋区域安全驶向非殖民化和非军事化的未来。

来源：

Indigenous environmental perspectives: Challenging the oceanic security state
Security Dialogue (2023), 1-22
<https://doi.org/10.1177/09670106221139765>

编译：何香凝

外国恐怖主义战斗人员概念的内在批评

Christopher Baker-Beall

伊拉克和叙利亚的冲突引发了西方对“外国战士”的担忧。尽管各国对这些人他们在加入的冲突中所扮演的角色感到焦虑，但他们最担心的是这些人员回国后所构成的“恐怖主义”威胁。这种恐惧导致了国际政策制定领域的演变，外国战斗人员现在通常被称为“外国恐怖主义战斗人员”(FTFs)。基于此，本文通过由批判理论启发的内在批评，对“外国恐怖主义战斗人员”的概念提出问题，思考它是如何以及为什么出现的，并探究这一术语对安全领域国际政策制定的后果。

首先，文章的内在批评表明了“外国恐怖主义战斗人员”概念是如何首次出现在全球反恐论坛和联合国等国际政策制定论坛上的，并突出了这一术语发展的更广泛的政治和社会后果。本文展示了来自“外国恐怖主义战斗人员”的威胁是如何被联合国等机构引用来证明新法律的发展是合理的，以及这些法律扩展了之前为全球协调反恐行动而建立跨国法律团体的努力。文章指出，在这种情况下，恐怖主义的标签变得很重要，它被援引并与外国战斗结合起来，作为一种有关“外国恐怖主义战斗人员”新法律合法化的方式。这些措施包括加强边境管制、限制旅行以及取消公民身份等有争议的做法。

其次，本文说明了“外国恐怖主义战斗人员”

概念存在的问题。这个术语具有缩小范围的作用，因为它对外国战斗的理解重新建构为简单的另一种恐怖主义形式。在对个人加入暴力“圣战”组织的担忧的驱使下，这一举措反映了一种简单化的、以政策为导向的处理恐怖主义方法，是不符合历史且未考虑到社会背景的。文章认为政策制定者应该避免使用“外国恐怖主义战斗人员”这个术语，有必要将外国战斗人员的概念与恐怖主义的概念脱钩，在讨论外国战斗人员问题时需要更精确地使用术语。

最后，文章认为“外国恐怖主义战斗人员”概念对人权有重要影响。文章认为，“外国恐怖主义战斗人员”概念产生了一种法律预期，即国家行为体将以打击恐怖主义为目的的新法律纳入其国内法。文章指出，将国家捆绑在一起以污名化被怀疑为“外国恐怖主义战斗人员”的个人的政策是有问题的。它使各国有可能将恐怖主义标签作为一种方式，以针对被国家认为是安全威胁的任何人。有人认为，如果要在跨国反恐中充分实现对人权的承诺，像联合国这样的机构需要确保从人权而不是安全优先的角度构建新的反恐法律文书。

来源：

The Concept of the Foreign Terrorist Fighter: An Immanent Critique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Security (2023), 8, 25–46. DOI:10.1017/eis.2022.30

编译：何香凝

Mélanie Juza: 更为频发的海洋热浪将愈影响野生动物、渔业及人们的生活（尤其在地中海）

海洋热浪在海洋温度长期处于极端热度时出现。更精确地，它指高于当地历史温度记录的 90% 的极端海洋温度持续了至少 5 天的现象。

虽然海洋热浪的研究相对晚近，但目前我们能够利用历史和近实时的海洋数据来探测和描述它们，并在次区域和局部规模上分析它们的长期变化。基于该规模的监测和分析有助于更好地理解海洋热浪的驱动因素、机制和后果，如对海洋生态系统、海洋环流和气候的影响。

海洋热浪由反常的大气条件或海洋过程引起，前者（如温暖的空气温度、地表风速的抑制、没有降水或没有云覆盖）增加了进入海洋的太阳辐射并减少了海洋热量损失，后者（如洋流）则运送暖流。

在地中海，海洋热浪与大规模的大气异常（如持续的高压系统）引起的炎热和干燥天气有关。这种大气条件引发了 2003 年夏季地中海和 2022 年西部次盆地的极端事件，这些事件均程度强烈、持续时间长、空间延伸广。

值得一提的是，地中海的海洋温度呈现出很强的空间变化，例如在岛屿的南部和北部，或在海岸附近，或在封闭的海湾。因此，局部范围内往往具有比区域范围内更高的海面温度。

海洋热浪严重影响了野生动物和渔业。

海洋温度上升和极端温暖事件威胁着海洋生态系统。若干研究表明，在表层和次表层，在世界范围内尤其是在地中

海，海洋物种及其栖息地都在遭受着毁灭性的影响，如珊瑚白化、海草草地和海藻林减少、有害的藻华现象、海洋生物大量死亡、行为的改变和海洋物种的重新分布。

在地中海，海洋热浪强烈影响了一些关键物种，如当地特有的海草草地（“Posidonia

特邀学者



Mélanie Juza 博士目前就职于西班牙巴利阿里群岛海岸观测和预报系统，担任建模和预报设施的工程师兼研究员。她的研究兴趣集中于物理海洋学。她最近的研究成果包括“地中海次区域海洋热浪观测：长期性表面变化、次表面和海岸反应”及“哥白尼海洋环境监测服务海洋状态报告”。

由于近期气温急剧上升，许多地区遭受了毁灭性破坏。7月18日，伦敦成为世界上最热的地方之一，预计温度将超过西撒哈拉和加勒比地区。今年夏天，科学家观测到从西班牙至土耳其的地中海地带都出现了一系列异常温度。海洋热浪是全球气候变暖的反映之一，给世界带来了许多负面影响。针对这一问题，中心对 Mélanie Juza 博士就海洋热浪的成因及其影响（尤其是在地中海地区）进行了独家访谈。

Oceanica”)或珊瑚种群。地中海的“热带化”，尤其是贪婪的入侵物种，也导致了栖息地的减少，并改变了海洋物种的分布。

同时，人们的生活也受到了影响。对海洋生态系统和生物多样性的破坏直接影响到海洋提供的商品和服务，影响到蓝色经济的各部门，如（通过物种的死亡、下降或迁移影响）渔业和（通过水母的传播、有害的藻华或传染病影响）旅游业。

此外，海洋温度的升高和作为触发因素的特定大气条件，也可能提高极端现象的频率和强度，例如可能导致洪水、海滩丧失或基础设施破坏的风暴和暴雨。

所有这些由海洋热浪引起的改变都与气候变化有关。海洋吸收了30%的人为碳和90%的气候系统多余热量。由于气候变化，海洋温度大幅上升。地中海是一个半封闭的、相对较小的海洋盆地，拥有许多岛屿和沿海地区，是气候变化最脆弱的地区之一，对全球变暖

反应迅速。更准确而言，地中海海洋表面温度的变暖率比全球海洋的变暖率高3-4倍，而且在过去几十年里大幅增加。

正如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在近期各种报告中所指出，极端事件越来越频繁和强烈，特别是海洋热浪。自1982年以来，它们的频率增加了一倍，强度也大大增加。在未来，如果不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海洋热浪预计会更加频繁，甚至会更加频繁。

翻译：方耀苑

David Welch: 反思安全——对冲突解决和管理的文化理解

解决与管理冲突的文化理解

在管理和解决冲突的领域，文化是一个研究不足的课题。原因在于，多年来，政治学简单地假设各国拥有固定的（相似的）利益，而决策者对于如何促进这些利益是“理性的”。这导致了对威慑、强迫、讨价还价、谈判、战略互动建模等的关注——所有这些基本都假设文化是无关紧要的。但该领域终于意识到，忽视文化是一个重大的疏忽。事实上，许多重要的国家利益是社会建构的，而不是“给予的”，人们关心的是他们的文化承诺。这些承诺包括有关正义和适当行为的强有力的规范，这些规范不仅涉及物质利益（如对争议领土的主张），还涉及诸如地位、尊严、尊重、荣誉和“面子”等观念和社会利益。它们还会影响互动的风格，包括谈判的

风格。每当国家陷入某种争端时，文化差异总是会带来沟通不畅、误解、误判和意外升级的风险。

值得强调的是，“文化”渗透到了社会互动的各个层面。文化有人种学家和人类学家研究的那种“民族”文化，也有外交文化。当前的国际体系实际上是一个国际社会，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深谙外交文化的国家更容易处理与同样深谙外交文化的国家的争端，而不是与“流氓”国家或尚未内化文明的国际行为准则的国家的争端。这可以部分解释为什么与朝鲜的外交如此困难，朝鲜政权从未完全遵守国际社会的准则。

显然，如果能很好地理解对方，处理争端就会更容易。这包括理解其兴趣和行为的文化基础。这种理解即“同理心”，



David Welch 博士目前就职于加拿大滑铁卢大学，担任政治科学教授。他的研究兴趣集中于国际关系与国际安全。他最近的研究成果包括《安全：一种哲学的考察》和《在南海究竟发生了什么？》等。

近期冲突越来越围绕着具有不同文化和文明的行为体而展开。然而，关于文化因素在理解全球和社会冲突中的作用的系统性知识很有限。针对这些议题，中心对 David Welch 博士就理解冲突与安全的文化视角进行了独家访谈，希望了解他对文化在冲突解决和管理中的作用，以及为使世界更安全，我们需要在理解安全的思维模式上作哪些重要改变的答案。

亦即从他者的角度看世界的能
力。同理心并不必要同意他人
的观点，但重建它确实需要真
诚的努力。同理心，就像文化
一样，是国际关系中一个未被
充分研究的概念。

思考安全时必要的思维模 式转变

这取决于一系列先导问题
的答案。对谁更安全？对什么
威胁的安全？我们如何知道什
么值得我们努力去使其变得更

安全呢？谁有资格做这样的判
断？这些都是我在新书《安全：
一种哲学的考察》（剑桥大学
出版社，2022 年）中提出并
试图回答的问题。分析的结论
是，为了使世界更安全，我们
的思维需要改变的两个最重要
的方面是：必须停止将地球视
为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资源宝
库，必须停止将我们自己（即
人类）置于安全分析的中心。
我们的首要义务是为所有先进
物种创造有价值的生存条件，

并为最终将取代我们的任何物
种留下良好的环境。当我们思
考安全问题时，我们倾向于痴
迷的那些问题（例如，国家间
的战争）在短期内可能是重要
的问题，但从长远来看，与扭
转我们作为一个物种对已知的
的唯一宜居的星球造成的破坏
相比，它们并不重要。

翻译：方耀苑



刘国柱： 数字标准的地缘政治论析——基于大国竞争的视角

在 当今国际政治的舞台上，技术标准、尤其是数字技术的标准与规则已经成为数字时代大国竞争的主要领域，数字标准的地缘政治化的趋势越来越明显。近年来，美国和欧盟的主流智库和行业机构，相继出台了围绕数字标准与地缘政治的分析报告，矛头集中对准中国。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在数字技术标准制定领域也将中国视为的主要竞争对手，并陆续推出了有针对性的数字标准竞争战略与政策。本文将围绕技术标准与规则的重要性、数字时代的大国竞争与数字标准的地缘政治化、全球数字治理的发展趋势等问题展开初步探讨。

一、数字标准与数字标准权力

技术标准是人类社会发展一定阶段的产物，也是促进社会进步和国家发展的重要因素。无论是中国古代秦灭六国后推行的“书同文、车同轨、度同制、行同伦”政策，还是古埃及统一砖的尺寸、古罗马帝国统一货币，体现的都是早期历史上标准与规则对于国家治理的重要性。随着现代世界市场的形成，标准设定可以被

视为建立国际治理的边界，因为它正式确立了市场经济竞争中的规则和边界。

标准是一种固有的技术活动，是无处不在的技术产品规范：国际技术标准的功能是确保互操作性、安全性及对现有的、更广泛的规则和措施的一般遵守程度。换句话说，通过标准，政策制定者确保消费者能够确信他们的产品是安全、可靠和优质的。同样，数字标准则是指导数字技术发展以确

保数字产品之间互操作性的既定规范——如果没有数字标准，国际数字贸易、商业和通信都将无法顺利地运行。数字标准涵盖了广泛的技术和相关的基础设施、设备、应用程序和服务。例如，由英特尔、IBM 和微软等美国计算机公司开发的通用串行总线（USB）已经成为计算机外设与主系统接口的全球标准；而互联网技术标准构成了使互联网正常工作的基础设施；传输控制协议/因特网协议（TCP/IP）——

研究员介绍



刘国柱是浙江大学历史学院美国研究中心主任、教授，浙江大学非传统安全与和平发展研究中心资深研究员，圣皮耶国际安全中心学术顾问。他的主要研究领域是非传统安全、美国对外战略与政策，著有《美国情报人员保护法研究》与《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连续性和多变性》等。

在万物互联的数字时代，大国竞争对传统的经济和技术领域构成了越来越严重的冲击。数字技术标准的制定能够赋能标准制定者经济竞争力、地缘政治与安全、价值观念等领域的优势，而与数字技术相关的新一代移动通信、人工智能、物联网、无人驾驶等产业的技术标准基本上还处于“待开发”状态，使得这一领域成为主要数字大国竞争的重要场域。国际技术标准的历史表明，技术设计最好、协作性最强、市场接受性最高的数字技术标准才是最成功的标准，须从地缘政治回归数字技术本身与全球数字治理。

这是两种能够通过互联网交换数据的协议；移动标准，如 5G，指导了移动通信网络的发展及其与移动运营商的集成。这些标准与它们所支持的软件和硬件一样重要。除了提供产品框架外，数字标准还有助于确保技术的透明和安全应用，并实现制造商之间协调互操作性。

正式或法律上的标准是由制度化的技术标准机构制定和管理的。这些组织可以是具有全球成员资格的非政府组织，如电气与电子工程师协会（Institute of Electrical and Electronics Engineers，简称 IEEE），也可以是国家会员制组织，如国际电信联盟（International Telecommunication Union，简称 ITU）和国际标准化组织（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for Standardization，简称 ISO），上述三大机构也是制定数字技术标准的主要国际标准制定组织。为制定标准，国际标准组织设立了特定的技术委员会，为特定技术或相关领域的规则起草协议。技术委员

会可以由行业直接组织，也可以由政府通过国家标准机构组织。如在国际电信联盟内部，电信标准化部门（ITU-T）专注于制定信息和通信技术（ICT）的国际技术标准（称为 ITU-T 建议书）；电气与电子工程师协会的标准协会（IEEE-SA）专注于制定与计算机技术、消费电子产品、网络安全、绿色和清洁技术以及有线和无线通信等相关的标准；第三代合作伙伴计划（The 3rd Generation Partnership Project，简称 3GPP）重点关注蜂窝（移动）电信技术的标准，包括无线电接入、移动互联网和服务能力等。在技术委员会内，专家工作组提出、测试、辩论和通过议定书，以纳入最终标准。纳入技术或协议的批准是通过共识和多数投票来完成的。

对国际标准组织所制定的标准，具有约束力的执行是通过世界贸易组织来完成的。为了应对 20 世纪 70 年代和 80 年代使用技术标准作为贸易壁垒，关贸总协定乌拉圭回合将有关技术标准的语言纳入技术性贸易壁垒（Technical Barriers

to Trade, 简称 TBT) 协定。TBT 协定要求世贸组织成员使用国际公认的标准, 除非存在重大的安全问题或当地国家面临重大挑战。独特的强制性标准可以作为贸易壁垒, 根据 TBT 规则被禁止。

除了技术细节之外, 技术标准的设定还可以作为一种地缘政治工具和一种施加影响的手段, 使用标准设定来建立地缘政治杠杆被定义为“标准权力”。以数字技术为核心的第四次科技革命引发的国际大变局, 更是为将标准用于更大的地缘政治目的提供了机会窗口。在新一代移动通信技术、人工智能、云计算、物联网等新兴技术领域, 尚未确立的技术标准已经成为包括中国、美国和欧盟等主要数字大国的国家战略重点, 各国都在努力使数字时代的国际技术标准尽可能与本国的国家发展战略保持一致。“标准权力”之所以能够成为大国竞争的重要内容, 主要在于它所带来的国家利益。“标准权力”至少在以下几个方面可以赋能国家利益。

首先, 技术标准赋能标准

制定方经济竞争力。从经济角度来看, 标准支持创新, 并帮助发展和维持企业和国家的竞争力。标准的确立往往对哪些技术将主导未来的市场具有重大影响, 并为那些掌握标准化技术的企业提供实质性的优势。当技术标准在世界范围内而非仅仅是某个国家或某个区域制定和采用时, 标准的价值将实现最大化。国际技术标准为企业打开进入世界市场的大门, 并通过避免贸易伙伴之间的技术差异来促进国际贸易。所以, 企业参与国际技术标准的目标非常直接而清晰, 那就是影响市场的发展, 故而业界有这样的说法: 谁掌握了标准、谁就拥有了市场。微软成功地将其 Open XML 格式确立为 ISO 标准, 极大地提高了其竞争数十亿美元政府合同的机会。

技术标准的很大一部分是由专利技术(即标准必要专利, SEPs)组成的, 这意味着相当大部分的技术标准并不是免费的。国际技术标准制定组织通常要求参与标准化工作的公司在公平、合理和非歧视性条款

下广泛提供其 SEPs, 确保专利所有者不能阻止任何人使用该标准, 但标准必要专利用户必须支付专利费才能实施该标准。专利费制度可以为专利所有者带来可观的收入。例如, 瑞典科技巨头爱立信在 2017 年通过专利技术许可盈利达 52 亿美元, 占该公司收入的 20% 以上。由于标准是持久的, 专利持续几十年, 标准必要专利所有者也获得了几十年的标准所有权带来的经济利益。

其次, 技术标准赋能标准制定方国际法优势。尽管国际技术标准是自愿制定的技术规范, 但技术标准一旦通过国际标准机构的认定, 这些标准便成为国际贸易法的组成部分。如果一个国家的国内标准偏离了国际标准, 世界贸易组织(WTO)的司法机构就可以依据技术贸易壁垒(TBT)协定, 判定该国不遵守国际贸易法。除非该国能够对上述偏离做出合理的解释, 如出于维护国家安全与稳定、公众利益的目的等, 偏离标准才会被视为合法。考虑到大约 80% 的贸易受到技术标准和相关技术法规

的影响，掌握标准制定权的一方在国际法上获得的优势更是不容小觑。

再次，技术标准赋能标准制定方地缘政治与安全领域的优势。近年来，世界主要大国在技术领域竞争日益加剧的背景下，技术标准对于地缘政治和安全领域的影响呈不断上升的趋势。越来越多的国家认识到，如果一个国家行为体通过参与国际技术标准的制定，影响具有战略意义产业的技术标准和规则，那么这个国家很可能在国际舞台上获得重大优势。“标准权力”竞争给国际格局带来的高风险，使得该领域难以免受地缘政治战略和地缘经济的影响。自 20 世纪初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电报标准的控制被证明是英国和德国之间地缘政治竞争的一个重要因素。冷战期间铁路轨距标准的定义则体现了北约欧洲成员与以苏联为首的东方阵营之间的地缘政治对立。

技术标准还被视为与国家安全密切攸关。从宏观的视角看，各国已经普遍接受“经济安全就是国家安全”的理念，

“标准权力”赋能国家的经济优势，无疑将增强维护国家安全的“硬实力”；从中观的视角看，“标准权力”赋予标准制定方利用具有战略意义的市场准入能力，即利用商品需求方对特定供应商依赖性的关系（也被称作“武器化相互依赖”），获得对他国强制权力的能力；从微观的视角也就是纯技术角度看，开发技术的一方对该技术的工作原理有更深入的了解，包括对技术漏洞的理解。一旦某项技术成为国际标准，该技术将在全球传播，这就给了技术标准制定方利用技术漏洞获取各种利益的机会。在数字时代，这样的技术标准化无疑会影响关键数字技术（如网络）安全。

最后，技术标准还赋能价值伦理与意识形态。任何技术都不是存在于真空之中的，在这个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多样化的世界，技术标准同样被赋予了伦理价值和意识形态色彩。无线局域网领域的 Wi-Fi 和 WLAN 之争，体现的就是不同的价值伦理和标准。Wi-Fi 更加强调个人隐私，

WLAN 则强调信息传输的速度和安全性。在数字技术日益渗透到公共和私人生活的所有领域之际，伦理、政治和安全问题正在技术标准化方面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在人工智能领域，算法偏差、算法决策的透明度和数据隐私构成技术标准化中伦理基础的三个领域。

除了经济、国际法、地缘政治与安全、价值伦理与意识形态方面的影响外，塑造国际技术标准的能力还提供了一种权力来源：如果一个国家能够塑造国际技术标准，它很可能树立世界技术领袖的形象，在国际事务中赢得信誉和重要影响力。这是技术至上的标志，是一种超越经济和军事实力的社会进步的标志。鉴于此，我们就能够理解，为什么技术标准已经成为数字时代大国竞争中最关键的领域之一。

二、数字时代中国在国际技术标准领域的影响力持续上升

在过去四十年的大部分时间里，国际标准化一直被少数工业化国家所主导，特别是

美国和欧洲国家，以及亚洲的日本、韩国等。近年来，中国为提高自己在国际标准制定方面的影响力做出了相当大的努力。作为一个相对较晚进入国际标准化领域的国家，中国将精力集中在尚未标准化的与数字技术相关战略性行业和新兴技术上，如无人机、锂电池、新一代移动通信技术、数据安全和人工智能、物联网、无人驾驶等。在欧美国家看来，至少在以下几个领域，中国影响力的上升正在颠覆传统的国际技术标准格局。

第一，在全球数字治理领域，中国在国际技术标准化组织中担任的领导职位越来越多。无论是在国际标准化组织的领导层，还是在国际标准化组织的技术委员会、小组委员会和工作组中，越来越多的有影响力的秘书处职位被来自中国的官员和技术专家获取。在国际标准化组织中，中国分别于2008年和2013年成为该机构的主要理事机构——国际标准化组织委员会和技术管理委员会的常任理事国。从2015年到2018年，中国公民张晓

刚担任了国际标准化组织轮值主席。舒印彪则担任了另一个重要国际标准制定机构——国际电工委员会的主席。中国官员赵厚麟从2015~2022年底，连续担任了两届国际电信联盟的秘书长。

在标准制定过程中，技术委员会、分技术委员会和工作组秘书处的影响更大。中国在这些技术委员会中的影响力同样也在上升。从2011年到2018年，中国代表在国际标准化组织技术委员会和分技术委员会秘书处中的职位占比从5%增长到8.21%。在国际标准化组织工作组秘书处的职位中，中国代表的占比从2%增至6.58%。根据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的统计，2011~2020年期间，中国代表在国际标准化组织技术委员会和分技术委员会秘书处的职位中的占比增加了73%；2012~2020年期间，中国代表在国际电工委员会中同类职位的占比增加了67%，增长速度几乎超过了任何一个国家。

在国际电信联盟研究组中，中国的管理职位占

14.1%，略高于欧盟（13.4%）、韩国（8.5%）、日本（7%）、美国（6.3%）和俄罗斯（3.5%）。中国在国际电信联盟焦点组管理职位中具有更强的领先地位，中国代表占这些职位的23.4%，其次是欧盟（12.8%）、美国、日本、韩国（均为8.5%）以及俄罗斯（4.3%）。在第三代合作伙伴（即3GPP）计划中，中国也获得了实质性的影响力，这是一个对无线技术标准至关重要的标准化机构。2017年，中国担任了约60个领导职位中的10个，高于2013年的8个。如果对领先的国际公司所拥有的领导职位进行比较，爱立信（瑞典）以6个领先，紧随其后的是华为（中国）和三星（韩国），均为5个，高通（美国）为4个，中国移动（中国）为3个。

在理论上，秘书处应该以纯粹的国际身份采取行动，而非仅仅从某个国家的视角考虑问题。但对多边机构的研究表明，在实际操作上，一个国家在领导结构和组织工作人员中的代表权，有利于这个国家在这些机构中维护本国企业的利

益。尽管一个健全的、基于规则的系统可以防止对领导角色的滥用，但具有领导能力的人能够影响议程和对话。

在欧美国家看来，正是由于在国际技术标准组织领导职位所占的比例不断增加，中国才能够采取一些有助于实现中国国家利益的措施，如在国际标准组织任用更多的中国企业和机构的技术专家，甚至直接服务于中国的对外经济和技术战略。美国战略界就曾经指责担任国际电信联盟秘书长的赵厚麟“大摇大摆”地为中国的数字企业华为推销，毫不顾忌地支持中国政府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

第二，中国越来越积极地参与甚至主导国际数字技术标准的制定。影响标准化的一个重要指标就是参与标准制定委员会的情况，它反映了哪些参与者可以向标准化过程提交建议和方案。自2007年以来，中国在这方面的影响力大幅增强，已超过美国、法国和日本，仅略低于英国和德国。另一个衡量标准是参与者的数量。在3GPP计划中，中国的参与

者份额最高，达23.7%，同期欧盟和美国企业的代表份额略降，各占22.5%。关于中国参与国际电信联盟、互联网工程任务组和电气电子工程师学会等其他国际标准制定机构的报告显示，中国参与国际化的程度也呈现出类似的增长趋势。

中国在国际数字标准制定中追求主导地位的一个例子是正在开发5G技术的标准。自2015年以来，5G标准一直是3GPP项目的重点，这是一个多利益相关者机构，包括来自中国、欧洲、印度、日本、韩国和美国的电信标准机构，并拥有来自全球各地的市场合作伙伴。通过3GPP制定的技术规范是国际电信联盟所考虑的标准建议的基础。中国一直是3GPP的积极和有影响力的参与者。根据数据公司IPlytics的数据，仅华为就占了3GPP技术贡献的近23%。这是美国领先公司高通份额的三倍多，该公司提交了已批准的3GPP技术贡献的不到7%。加入3GPP并拥有投票权的中国公司也比美国公司多出两倍(110

比53)。

第三，中国在标准必要专利，尤其是移动通信领域标准必要专利的快速上升，有颠覆这一领域现有国际格局的趋势。标准必要专利之所以引起广泛关注，是因为包括5G在内的许多关键技术标准在很大程度上由专利技术组成。尤其是在严重依赖标准化的电信行业，大量创新（包括Wi-Fi网络和5G）受到标准必要专利的保护；标准必要专利还具有相关的宏观经济效应，可以作为在一个国家内维持价值创造的工具，这就是它们对政策制定者的重要性。根据欧盟委员会的说法，这些专利是促进创新的关键工具，可确保其持有者获得适当的研发投资回报。

早在2016年，欧盟委员会就预测，来自中国公司申报的标准必要专利份额将越来越大，而且重点在数字技术领域如电信行业。在4G/LTE技术方面，中国在2018年只拥有约7%的标准必要专利，但现在在中国拥有约三分之一的5G技术相关标准必要专利。截至

2021年2月，华为申报的5G专利最多，其次是美国的高通公司和另一家中国公司中兴通讯。

中国在3GPP的主导地位也让华为在全球5G网络领域的影响力不断扩大。如上所述，标准对企业的经济竞争力具有重要影响。华为在全球范围内成功地推出了技术标准，为华为带来了先发优势，并使华为能够巩固其在5G部署方面的影响力。华为所持有的标准必要专利最终将为其带来巨大的经济效益。

第四，通过双边和多边合作机制，扩大中国数字标准在国际上的影响力。推进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双边和多边标准合作，是实现中国标准化战略的重要手段。中国与发达国家的标准合作侧重数字技术领域，如与法国合作的智慧城市和可持续城市发展标准，以及与德国合作的工业4.0（即高技术制造）标准。与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的标准合作涵盖了更广泛的领域，往往通过贸易协定的方式，也被视为中国将国内标准国际化的

机会。截至2019年底，中国已与54个国家和地区标准化机构和国际组织签订了97项双边和多边合作协议。中国还参与了世界上主要的区域标准机构的工作，如泛美标准委员会（the Pan American Standards Commission，简称COPANT）、欧洲标准化委员会（The European Committee for Standardization，简称CEN）、欧洲电工标准化委员会（The European Electrotechnical Committee for Standardization，简称CENELEC）、太平洋地区标准化大会（The Pacific Area Standards Congress，简称PASC）和非洲标准化组织（the African Regional Organisation for Standardisation，简称ARSO）等。

中国扩大数字标准国际影响力的努力还得到了中国政府涉外经济活动的支持。首先是“一带一路”倡议，这一倡议本身就包括一个明确的标准化内容。2015年，中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发布了《标准联通“一带一路”行动计划

（2015-2017）》。2017年底，国家发改委又颁布了《标准联通共建“一带一路”行动计划（2018-2020）》，该计划强调大力推动中国标准国际化，强化标准与政策、规则的有机衔接，以标准“软联通”打造合作“硬机制”。2019年9月，中国正式宣布与“一带一路”沿线的52个国家和地区签署90项技术标准化合作协议。作为数字丝绸之路的一部分，中国还与“一带一路”国家签署了16份关于制定数字化标准的谅解备忘录。

然而，在欧美国家看来，中国在影响国际技术标准化组织方面的成功与中国采用国际标准的意愿并不匹配。20世纪90年代末，中国多达70%的新标准都来自国际标准化组织。2005年，国际标准所占的比例为54%。到2017年，这一比例进一步下降至不超过21%。因而，欧美国家认为，中国标准化参与的核心动机不是国际标准，而是中国对权力的渴望；中国寻求实现全球技术领导地位和从标准接受者向标准制造者的转变，既是商业

驱动和意识形态驱动的，同时也反映了中国作为一个大国的新地位。总之，中国的技术规范 and 标准政策被视为中国地缘政治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欧美国家认为，中国在以下几个领域对现有的国际技术标准秩序与格局构成了巨大的冲击。

第一，中国对既有的国际标准秩序构成了挑战。中国越来越多地参与国际标准的制定，不可避免地意味着更多的竞争。因此，对现有的标准大国（无论是国家还是机构）构成了挑战，他们担心与强大的新玩家的竞争可能会造成自身的失利。所以他们需要调整自己的参与程度，增加他们的资源。中国庞大的经济 and 市场规模、在世界经济日益上升的重要性打破了传统国际技术标准生态系统的平衡。

第二，中国对国际社会既有的国际技术标准制定模式构成了挑战。从历史上看，美国制定标准的方法一直是分散的，其特点是偏好行业主导和多方利益相关者的参与；欧盟则是在私营公司、非营利组织和欧盟委员会组成的标准共同

体之间保持着公私伙伴关系，这种伙伴关系被定义为一种自下而上、由行业主导的标准制定方法，并由欧盟委员会强制加强监管框架。在欧美国家看来，中国正在推进建设的是“市场驱动、政府主导”的标准化体系，属于国家产业政策的一部分。尤其是 2021 年 10 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国家标准化发展纲要》，设定了一系列与研究和开发标准相关的目标，囊括了人工智能、量子信息、区块链、无人驾驶、数字金融、电子商务、共享经济等数字技术与产业，被欧美国家视为中国提升在国际上综合竞争力、实现民族复兴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

第三，中国的数字技术标准、规则对西方的价值观和原则构成了巨大挑战。从互联网到人工智能，数字技术对社会的影响比以前的技术要大得多。因此，对数字技术标准的制定不仅会产生经济影响，还会带来价值观念变化等问题。2019 年，华为联合中国电信、中国联通和中国工信部向国际电信联盟提出一项新的核心网

络技术标准（New Internet Protocol, 简称 New IP），取代美国主导建立起来的现有的互联网协议，以更尖端的技术实现互联网的迭代。但这个方案被欧美国家攻击为“反乌托邦”和“专制”。而中国政府利用数字技术、特别是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构建“平安社会”“智慧城市”“智慧警务”等社会治理模式，被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认为是在国内建立起严密的监控体系；此外，西方国家还攻击中国通过数字丝绸之路，将中国的数字技术和数字治理标准和模式推广到世界其他地区，是在输出“数字威权主义”。在欧美国家看来，如果中国的数字技术标准战略取得成功，将导致自由的经济和不自由的国际政治秩序。第四，中国通过参与国际数字技术标准的制定，在一些重要领域获得市场主导地位。特别是华为在 5G 标准制定领域的优势，奠定了华为在新一代移动通信领域的市场优势地位。

正是基于上述因素，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愈来愈将数字标准的制定地缘政治化，并

将中国视为这一领域最主要的竞争对手，近年来陆续出台对华竞争的战略与政策。

三、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数字标准战略与政策的地缘政治化

在数字经济领域，走在世界最前面的主要是中美两国。根据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UNCTAD）发布的《2019年数字经济报告》，数字经济中的财富创造高度集中在美国和中国，世界其他地区，尤其是非洲和拉丁美洲国家，远远落后。美国和中国占与区块链技术相关的所有专利的75%，占全球物联网（IoT）支出的50%。亚马逊、微软、阿里巴巴、谷歌和华为则占据了全球80%以上的云计算市场。全球七大超级数字平台——微软、苹果、亚马逊、谷歌、Facebook、腾讯和阿里巴巴——占全球前70家最大数字平台总市值的三分之二。作为目前唯一有能力在数字技术和数字经济领域同美国竞争的对手，中国自然被美国视为在数字经济、数字技术领域的最主要竞争者。鉴于数字技术标准、数字技术与

数字经济运行规则在经济增长和国家安全领域的重要性，近年来，美国明显加大了在上述领域对华的竞争力度。

特朗普政府时期，美国第一次意识到在中美大国竞争中，技术标准是一个很重要的领域。在美国白宫2020年10月颁布的《美国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战略方针》这一文件中，“标准”一词出现了10次，其中8次用于表示“技术标准”或“行业标准”。在白宫发布的顶级战略文件中，“标准”一词反复出现，可以说史无前例。这份文件清楚地表明了美国对中国标准化的看法，认为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和其他举措“旨在重塑国际规范、标准和网络，以促进中国的全球利益和愿景，同时服务于中国的国内经济需求”。该文件声称中国的目标是扩大“中国工业标准在关键技术领域的使用，是以牺牲非中国公司为代价来加强其自己公司在全球市场上的地位”。这一文件确立了反对中国标准国际化的具体政策方向。美国政府计划“为安全、弹性和可信的通信平台推广一

套通用标准”，宣称美国将继续“引领新兴产业的创新和制定标准”，并“与盟国和伙伴合作，确保歧视性行业标准不会成为全球标准”。毫无疑问，在特朗普政府眼中，“歧视性标准就是指中国制定的标准。这也是在美国顶级的战略性文件中，第一次将“技术标准”问题地缘政治化，即将其视为对华战略竞争的重要组成部分。

美国对中国在国际技术标准领域崛起的警惕在拜登政府的领导下进一步加强。拜登入主白宫后不久，便于2021年2月颁布了《美国供应链行政命令》，对具有战略意义的产品供应链进行为期100天的审查。随后的报告《建立弹性供应链，振兴美国制造业和促进基础广泛的增长》强调：“标准和数据是一种强大的工具，它可以让公司不仅在价格上区分其产品和服务，并创造出一种向顶端竞争的市场拉动。”该报告旨在“确定政府在哪些关键领域可以对制定标准和激励商业实践发挥更积极的作用，通过建立强有力的国内标准或倡导建立全球标准，美国

可以支持私营部门创造和采用弹性实践的能力。”

美国立法机构同样关注到中国在国际技术标准领域影响力的上升可能会影响美国国家利益，在2020年通过的《2021国防授权法》中，要求美国行政部门重视中国国际技术标准政策及其对国际标准制定的影响。该法案要求美国国家标准与技术研究院（NIST），就中国对从事发展和制定新兴技术国际标准的国际机构的影响进行研究并提出建议，包括：评估中国在国际标准制定组织中的作用增强、在标准技术委员会中的领导角色、以及参与标准制定的质量或价值；审查选择新兴技术的国际标准是否旨在促进中国在“中国制造2025”计划中所表达的利益；考察中国参与国际标准制定组织的实践，预测中国可能从事国际标准化活动的关键技术如人工智能和量子信息科学，以及可能产生的后果；美国如何采取措施减轻中国的影响，并支持美国公共和私营部门参与国际标准制定组织。

2022年8月初，美国参众

两院先后通过的《美国芯片与科学法案》，在美国参与国际标准制定方面也提出了具体行动方案，包括：了解联邦政府在国际技术标准方面的作用和需求；组织制定对美国感兴趣的国际技术标准；增强美国在国际标准组织中的代表性和影响力；支持具有领域专业知识的人（特别是来自位于美国的小企业）参与从事技术标准的领导职位、工作组和会议；支持由联邦政府、联邦资助的研究中心、研究和发展中心、大学附属研究中心、高等教育机构、工业、行业协会、非营利组织和其他主要贡献者等美国机构参与制定的国际技术标准；鼓励国际标准组织采用在美国制定的技术标准；确定支持美国参与国际标准发展、提升经济竞争力、制定和使用国际技术标准等国家安全所必需的其他活动。

自特朗普时期开始，美国逐渐确立了在国际技术标准特别是数字技术标准领域的竞争战略和政策，概括而言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力争在国际技术标

准制定领域获得领导权。中国在国际技术标准组织领导层影响力的上升引起美国的警觉，争夺国际技术标准组织的领导权成为美国标准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2019年2月11日，特朗普发布了《保持美国在人工智能领域领导地位》的行政命令，强调“美国在人工智能领域的持续领导对于维护美国的经济和国家安全，以及以符合我们国家的价值观、政策和优先事项的方式塑造人工智能的全球发展至关重要”。他要求美国商务部长“通过国家标准与技术研究院主任发布联邦参与制定技术标准和相关工具的计划”。该计划的核心内容有两点：第一，确定美国联邦机构应寻求加入的标准制定实体，以建立或支持美国的技术领导角色；第二，美国在人工智能技术相关标准化方面寻求领导地位面临的机遇和挑战。

近年来，美国也一直在寻求争取重要国际标准组织领导权。在2021年国际电信联盟秘书长的选举过程中，前美国商务部国家电信和信息管理局（NTIA）的专家多琳·博格丹-

马丁女士击败了俄罗斯人拉希德·伊斯梅洛夫，当选为下一任国际电信联盟秘书长。在选举过程中，马丁得到了来自美国政府的“强烈支持”。美国总统拜登亲自为马丁背书，称她“具有改变数字格局所必需的正直、经验和远见”。在美国国务院的网站上，美国国务卿、商务部长、国际开发署署长、联邦通讯委员会主席共同为马丁站台。竞选成功后，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祝贺马丁当选的贺信中称，马丁的当选“对于促进世界电信网络的连通性和互操作性至关重要”。为表示对马丁工作的支持，美国政府宣布计划将其对国际电信联盟分摊会费比例从30个会费单位增加到35个会费单位，相当于每年增加近160万瑞士法郎支持这一重要国际技术标准组织的工作。

其次，以美国价值观为核心，打造全球数字技术生态环境。在美国看来，中国是利用数字技术标准来改变全球数字生态环境。作为对冲，美国必须以打造反映美国核心价值观念的全球数字生态环境，限制

中国的数字技术标准。2021年7月13日，在美国人工智能国家安全委员会（National Security Commission on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简称NSCAI）主持的全球新兴技术峰会（Global Emerging Technology Summit）上，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呼吁道：“我们的任务是提出并实现一个令人信服的愿景，即如何以服务于我们的人民、保护我们的利益和维护我们的民主价值观的方式使用技术。仅仅强调技术威权主义的可怕……是不够的，我们还必须为我们自己的方法提供积极的方案。”具体分析，以美国价值观为基础的数字技术生态系统具有如下特征。

一是自由、开放、可互操作性。美国政府认为，越来越多的国家在接受中国所倡导的“网络主权”的观念，并在中国帮助下建立了各自的网络审查机构和严密的“防火墙”，让被称作“乌托邦”的互联网世界正在变得越来越封闭和支离破碎，数据的自由流动也变得越来越困难。布林肯在上述演说中同样强调，在美国参与的所

有数字技术领域，从数字技术标准到数字基础设施，从数字贸易协议到全球数字治理，美国都坚定地捍卫自由、开放、可互操作的原则，促进宽松的监管方式，避免政府机构过度监管以至于妨碍数字技术创新与应用。

二是可信连接。“信任”指的是公众对数字连接的信心，它既包括对连接性和技术表现的信心，同时也包括对其运营提供信息和管理政治和法律体系的信心。例如，特朗普在《保持美国在人工智能领域的领导地位》的行政命令中所言，必须“确保技术标准最大限度地降低脆弱性以抵抗恶意行为者攻击；反映联邦在创新、公众信任和公众对使用人工智能技术的系统的信心方面的优先事项；并制定国际标准以促进和保护这些优先事项。”可信连接有两个基本属性：技术保障和政治、法律保证。

三是开放数据与数据安全、个人隐私并重。前文已述及，美国政府格外重视数字时代数据的开放性，反对政府机构的严格管控。但在强调开放

与互操作性的同时，对数据安全与个人隐私同样给予关注。特朗普在上述行政命令中要求联邦机构探索根据适用的法律和政策、隐私和个人数据保护以及公民自由保护，对敏感或受限数据和模型的访问进行适当控制。为保护数据安全与个人隐私，拜登政府还颁布了《保护美国的敏感数据免受外国对手攻击》的行政命令，建立了新的数据安全审查程序，并为软件应用程序增加了额外标准。这一行政命令还要求美国商务部酌情采取行动，“提供识别可能构成不可接受的风险的软件应用程序标准”，防止伤害、转移或访问敏感的个人数据，包括个人身份信息和遗传信息，以及大型数据库，等等。

第三，积极打造科技联盟，在美国主导的科技联盟中，与盟友和合作伙伴合作主导数字技术、数字产业的标准以及数字经济的运行规则。美国与盟友以及合作伙伴在这一领域的合作可以分为以下三个维度。

第一个维度，共同确立数字技术标准以及规则的价值体

系。2021年6月15日，美国-欧盟峰会发表的联合声明中强调：“计划在我们共同的民主价值观（包括尊重人权）的基础上合作开发和部署新技术，并鼓励兼容的标准和法规。”例如，在数字经济治理方面，美欧双方在起草保护跨境数据流动的规则时都关注个人权利。在美国主导的美、日、印、澳四国安全框架（QUAD）中，美国同样将新兴技术标准问题植入这一地缘政治框架中，在领导人峰会发表的关于新兴技术领域合作的原则声明中强调，四方将在新兴技术、网络空间和网络安全方面开展合作，引领该地区及其他地区走向负责任、开放和高标准的创新。四国安全框架还着重强调三个关键原则：支持普世价值；建立信任、诚信和复原力；促进良性竞争和国际合作，推进科技前沿。在详细阐述这些原则时，该框架还指出了技术发展的重要性，及保持普世价值观的神圣性，包括“尊重言论自由和隐私”，促进技术开发生和使用符合共同价值观，也包括“自治、代理和个人尊严”，

且技术发展应该由“一个既不涉及也不导致不公平歧视行为的公平和包容的过程”驱动。四国安全框架还指出，“技术不应被滥用或滥用于威权监视和压迫等恶意活动、恐怖主义目的或传播虚假信息”。尽管没有点名，但针对中国的指向性非常明显。

第二个维度，在以数字技术为中心的新兴技术标准领域，美国开始与盟友及合作伙伴建立有效的合作机制。2021年9月，美、日、印、澳四国领导人峰会决定建立技术标准联络小组，重点关注新一代移动通信和人工智能，包括制定标准和基础性预标准化研究。而稍晚正式启动的“美国-欧盟贸易与技术委员会”（简称TTC）成立了10个工作小组，协调解决关键技术问题，其中第一工作组就是负责制定关键和新兴技术标准（包括人工智能和其他新兴技术）的协调与合作方法：“美国和欧盟旨在寻找主动行动的合作机会，并捍卫我们在关键和新兴技术的国际标准活动中的共同利益。因此，我们计划建立正式和非

正式的合作机制，以共享相关特定技术领域技术提案的信息，并寻求机会协调国际标准活动。”

第三个维度，为盟友和伙伴制定了完全针对中国的行动计划——“清洁网络计划”（Clean Network），该计划号称“以国际公认的数字信任标准为基础”，“解决专制恶意行为者对自由世界构成的数据隐私、安全、人权和原则性协作的长期威胁”。“清洁网络”包括：“清洁载体”——确保中国运营商未连接到美国电信网络；“清洁商店”——从美国移动应用商店中删除不受信任的应用程序；“清洁应用程序”——防止不受信任的中国智能手机制造商在其应用程序商店中预安装（或以其他方式提供下载）不受信任的应用程序；“清洁的云”——防止美国公民最敏感的个人信息和最有价值的知识产权在如阿里巴巴、百度等基于云的系统上存储和处理；“清洁电缆”——与外国合作伙伴合作，确保连接美国与全球互联网的海底电缆不被破坏，而供中国大规模收集情报；“清

洁路径”——不使用来自不受信任的IT供应商（如华为、中兴通讯）的任何传输、控制、计算或存储设备。在美国的积极游说和巨大压力之下，到2020年底，代表全球GDP的60%的60个国家、200家电信公司和数字企业如富士通、甲骨文、思科、西门子、惠普等已经加入到“清洁网络”计划中。拜登政府上台后，还在继续对包括以色列在内的一些国家施加压力，要求它们参与“清洁网络”行动。

第四，美国政府机构也在采取措施，为美国企业和行业协会参与国际标准组织活动提供政策支持，促进而美国企业参与国际标准活动。2019年5月，特朗普政府将华为及其68家关联公司列入“实体清单”，这导致美国公司在参与华为也同时参与的国际标准制定活动时，会涉嫌违反美国政府的出口管制政策。为解决美国数字技术企业的担忧，特朗普政府于2020年6月发布了一项豁免规则：“未经许可向实体清单上的华为及其关联公司发布某些技术，如果此类发布是为

了促进‘标准组织’中‘标准’的修订或开发而发布的，则可豁免。”然而，随着近年来美国“实体清单”中的中国数字技术企业越来越多，美国企业提出，将豁免范围仅限于华为及其关联公司，并不能充分缓解美国公司寻求参与全球标准制定机构的风险。拜登政府上台后，美国商务部工业与安全局重新审核了特朗普政府的相关政策，认为“任何阻碍美国在标准制定领域影响力的行为都是对美国国家安全的威胁，因为这将限制美国在标准制定方面的领导地位，而且其他国家已经在竞相用自己的领导地位和标准来填补这一空白”。为解决这一问题，美国商务部工业与安全局和国家标准技术研究院又于2022年9月9日共同发布了一项临时最终规则。新规则有三大变化：扩大了实体清单许可要求的例外范围，新增了“技术”和“软件”；允许美国公司在“标准相关活动”的背景下，发布某些类型的加密技术和软件；新规则删除了先前被认为令人困惑的“标准”和“标准组织”的定义，并用“标准相关活动”

的定义取而代之，以包括任何标准的开发、采用或应用，目的是最终标准将被“发布”。这一改变为美国数字企业参与与中国公司参与的国际数字标准制定活动打开了方便之门，避免美国由于自己的实体清单制度将美国企业挡在国际技术标准制定的大门之外，将国际技术标准的制定拱手让人。

总体来看，美国将中国视为包括半导体、移动通信、人工智能、物联网、量子信息技术、无人驾驶车辆等数字技术和产业的最主要竞争者，不仅已经出台了一系列打压中国数字技术发展的政策，更将会在国际数字技术标准的制定方面加大对华竞争的力度。如果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在数字技术标准方面“脱钩”，将不可避免地造成两套标准并行，增加数字时代全球分裂的风险。

结语：数字技术标准须从地缘政治回归技术本身与全球治理

随着大国竞争的回归，传统的地缘政治已经影响到越来越多的领域，数字技术标准的

地缘政治化在短期内恐将成为国际社会不得不面对的一个问题。但总体而言，数字技术标准与运行规则，主要涉及数字技术问题和数字技术、数字经济、数字贸易的全球治理问题。

从数字技术层面来看，任何数字大国或企业都会承认，数字标准本身并不是目的，只有当标准被纳入数字商品和数字服务中使用的技术时，它们才有价值。任何数字标准，即使被国际技术标准组织采纳，如果不能获得市场的认可，就没有什么价值可言。国际技术标准组织的发展历史表明：最成功的标准往往是技术设计最好、协作性最强、市场接受度最高的标准，而不是某个国家政府最为支持的标准。

中国在国际标准机构，尤其是涉及数字技术的国际标准组织中的影响力上升，主要得益于中国数字技术的发展与进步和中国数字技术产品市场的壮大。中国越来越多地参与国际标准化活动，代表中国更加倾向于支持国际标准组织，而不是试图颠覆传统的国际标准秩序；中国是希望更加积极的

融入国际标准体系，而不是与现有的国际标准体系“脱钩”。作为一个巨大的数字产品出口国，同时还是一个巨大的数字产品进口国，中国参与国际数字技术标准的制定，无疑可以加强这个万物互联的世界的互操作性”和标准上的“兼容性”。国际标准界在很大程度上也承认，中国增加参与国际标准化活动是一种积极的现象，并未导致中国在国际标准机构中比例过高的问题。在主要国际标准组织中，美国及其盟友、尤其是欧洲国家依然居于主导地位。

同时，各国也应该对全球数字治理的差异性有一个客观的认识，即使是欧美国家之间，在数字治理方面也存在着巨大的差异。简言之，美国采取的是自由放任、依赖于自由竞争的极简主义标准化，由市场决定采用哪些标准，淘汰哪些标准；欧盟则主张更多政府干预性的标准模式，欧洲标准化工作的一个重要特点是设置了清晰的标准组织层次结构。例如，如果欧盟发布的标准与成员国标准相抵触，后者就会自动失

效，因而欧盟经常被称作是“监管超级大国”。此外，在数字领域，无论是涉及人权还是个人隐私，或是在数字标准制定的框架体系中，美国与欧洲国家同样存在着巨大的差异。例如，美国将数据视为一种资本形式，可以共享并用于获利，只要个人隐私得到保障，美国就会允许数据无限自由流动；欧盟的理念则是认为个人应该有能力和控制他们自己生

成的数据，体现这一理念的欧盟《通用数据保护条例》和《数字市场法》被美国视为了经济民族主义，构成了美欧之间在数字标准领域一道看似微小但难以逾越的沟壑。而欧盟所倡导的“数字主权”，与中国主张的“网络主权”则有异曲同工之处。

各国在数字技术治理领域的差异性并不一定会导致数字技术的地缘政治化，解决差

异的最有效途径还在于国际合作，即从全球数字技术治理角度的合作。让数字技术标准回归相关国际技术标准组织，在国际标准组织内解决各国在数字技术标准方面的差异；让数字贸易、跨境数据流动回归地区和全球贸易体系，逐步为未来的数字WTO创造条件，尽管这个过程可能会比较漫长。

编辑：王星懿



Diana Toimbek: 哈萨克斯坦的能源安全及其影响

能源安全是一个复杂的问题。近年来，由于能源需求不断增长、能源价格不断上涨以及气候变化的影响，这个问题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世界各地的政府、政策制定者和企业正在采取措施加强能源安全，减少对外国石油的依赖，并促进可再生能源的发展。

文献中对能源安全有不同的定义。一些定义侧重于能源供应的可靠性和可负担性，而其他定义则强调能源使用的环境和地缘政治影响。例如，国际能源署将能源安全定义为“以可承受的价格不间断地提供能源”（IEA,2019）。美国能源部将能源安

全定义为“美国确保拥有满足国家安全和经济需求的能源资源的能力”（USDOE,2020）。因此，它是任何国家的经济和国家安全的一个重要方面。它指的是一个国家在不影响其经济和政治稳定的情况下，以可靠和可负担的方式满足其能源需求的能力。能源安全不仅对发达国家很重要，对正在努力实现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发展中国家也很重要。

由于这个部门对经济发展

和国家安全至关重要，如果不能获得可靠和负担得起的能源，经济将受到影响，人们的生活水平将下降。依靠能源的行业，如制造业、运输业和农业，将受到影响，其在全球市场的竞争能力将受到损害。此外，能源安全对国家安全至关重要。依赖进口能源的国家很容易受到供应中断的影响，这些中断可能是由地缘政治紧张局势、自然灾害或基础设施故障造成的。这些中断可能导致停电、经济不稳定和社会动荡。

例如，1973年的石油危机，是由阿拉伯产油国实施的禁运引起的，导致了許多国家普遍能源短缺、通货膨胀和经济衰退。

今天，能源是包括哈萨克斯坦在内的每个国家最重要的经济部门之一，能源安全被列为国家安全，尤其是经济安全中最重要部分。能源消费每年都在增加，满足这一需求是首要任务。可以说，确保能源安全是当前的重要领域，受

专栏作家



Diana Toimbek 是哈萨克斯坦阿斯塔纳 IT 大学的社会科学博士，政治学副教授，圣皮耶国际安全中心研究员。她的主要研究领域是非传统安全，著有《非传统安全话语《哈萨克的形成与演变》、《斯坦向知识经济转型的问题和前景》等。

内外部因素的影响，其重要性在近几年来明显增强。因此，能源安全被认为是经济安全体系中主要内容之一，它意味着要优化利用有限的资源和使用环境友好的自然、能源和材料节约技术，包括原材料的提取和加工、创造环境友好产品、最小化、加工和废物销毁。

确定能源安全的地位和作用，主要取决于各国获得能源资源的程度。在这方面，我们可以列出：自身储量不大的国家；能源资源供应一般的国家；以及自身资源丰富的国家。第一种国家高度依赖进口，能源安全通常更多地被理解为“供应安全”，即建立有保障的内部和外部能源，以克服对外部能源的依赖。欧盟能源战略的内容证实了这一点，它听起来像是“能源供应安全战略”。这种做法反映了进口国对能源安全问题的独到见解。对于第二类拥有中等能源资源储备的国家来说，依靠自身力量满足能源需求的能力是非常重要的。在国内资源相对丰富的情况下，主要强调的是保持所谓的“需求稳定”。因此，能源安全

被分为“供应安全”、“自己提供能源资源的能力”和“需求稳定”。

最近，人们能够观察到对于能源安全概念的解释发生了一定的变化。如果说早期的能源安全被理解为只向主要消费者提供稳定的碳氢化合物资源，那么现在它被解释得更加广泛，包括生产、运输和在世界市场上的销售。相应地，不仅是供应国，还有过境国、消费者以及跨国能源公司，也就是能源链中所有环节的代表，都必须承担各自的责任。因此，在部门间、区域和国家间的运作条件基础上加强国家和企业实体在经济和能源领域的互动是有可能的。这些情况，以及需要找到更有效的公共管理形式来确保国家的能源安全，同时考虑到其社会方面和实现“能源 - 经济 - 生态”的三重平衡，预先确定了主题的相关性。向生态经济和可持续发展经济的过渡与自然资源的生产和消费的增加、枯竭、退化及其不可替代性有关，这反过来又对国家的社会发展产生负面影响。

在现代社会，能源安全正

成为经济、社会和环境参数系统稳定的条件之一，这些参数决定了人们的生活质量，实质上也是公共管理有效性的一个指标。“能源安全”概念的复杂性和多面性体现在其解释上。正如许多研究者指出的那样，“能源安全问题”的概念产生于20世纪初，这一概念的产生是由于国家的武装部队和军工复合体需要石油和石油产品的不间断供应。同时，对能源安全问题的首次学术研究可以追溯到上世纪60年代，这在70年代的石油危机中派上了用场。后来，在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由于石油价格的稳定、经济禁运威胁的减少、以及一些国家恢复在独立期间取消的经济联系，科学家对能源安全的兴趣有所下降。到了21世纪初，由于亚洲国家的需求增加、对欧洲的天然气供应中断、以及各国由于气候变化而需要推行能源系统去碳化的政策，能源安全问题重新成为焦点。

能源安全的概念在现代和“古典”的话语中有着明显的区别。如前所述，在20世纪70

年代和80年代，能源安全意味着在禁运和出口国操纵价格的威胁下，廉价石油供应的稳定性。能源安全问题的现代意义已经远远超出了提供石油的范围，包括了一系列广泛的问题。此外，能源安全与其他能源问题密切相关，如确保平等获得能源的同时减轻气候变化的影响。因此，现代社会面临着对经典语境下能源安全概念的反思的任务。

在西方文献中，该领域的许多研究者在21世纪初将能源安全表述为“4As”，即可用性（地质意义上的资源可用性）、可获取性（地缘政治意义上的资源获取能力）、可负担性（金融和经济意义上的供应适宜性）、可接受性（社会和环境意义上的供应条件可接受）。同时，有人怀疑“4As”表述不太可能有助于能源安全“新范式”的概念化，因为人们普遍认为能源安全在不同情况下对不同的人意味着不同的东西。

因此，在任何定义中，能源独立都是确保一个国家能源安全的最有力机制，也是对

与外部因素相关发展的能源可持续性的保证。在能源独立的因素中，能确保在任何地区以必要数量获得所需类型的能源的因素，是与内部影响有关的能源安全的主要指标。同样的因素也决定了一个国家的能源部门对外部条件的稳定性。因此，能源安全与影响能源独立的因素一样，也是由每种能源的可负担性决定的。这些表述表明，在有足够差异的情况下，这些有关能源部门的独立性、安全性、效率和可持续性的定义是紧密联系在一起并相互影响的。可持续发展的一般原则包括对于确保后代利益和保护环境的要求。根据这一原则，决定能源部门可持续发展的主要参数是：

- 在一个国家的能源综合体的整个周期中，经济和技术效率达到世界水平。

- 能源对环境的影响水平，确保自我修复。

- 内部政策旨在确保向所有社会群体提供不低于一定社会最低标准的所有必要类型的能源。

- 各地区消费不均衡的可接受水平。

- 能源综合体的最佳体制结构。

- 参与国际能源市场。

对哈萨克斯坦共和国来说，向可持续发展过渡是一个迫切的需要，因为能源部门是国家社会经济生活中的主要环节之一。该部门生产的工业产品占很大一部分，国家的发展主要靠能源出口。哈萨克斯坦拥有煤炭、铀、石油、天然气、金属和矿石的储备，在水力发电和使用其他可再生能源方面有很大的潜力。哈萨克斯坦的可回收燃料资源（石油、天然气、煤炭和铀）总量约为 349 亿吨。在哈萨克斯坦可开采的自然能源资源结构中，主要份额是煤炭和铀储量（分别为 46% 和 30%），而石油和天然气在总量中占比高达 25%。尽管石油和天然气的实物量相当大，但在国家能源资源中的份额很小，这是由于煤炭超过 700 亿吨的巨大储量（地质储量超过 1750 亿吨）。哈萨克斯坦大陆部分的预测可采资源

估计超过 100 亿吨的石油和油气，以及超过 7 万亿立方米的天然气。里海的哈萨克部分的资源估计为 130 亿吨石油。在已达到的生产水平上，煤炭储量可以说是无限的。

由于有大量的化石燃料储备，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哈萨克斯坦是世界上 20 个一次能源资源生产的领导者之一，每年的总量约为 1.6 亿吨。根据国际能源署和世界银行的数据，哈萨克斯坦鉴于人口相对较少和相应的经济规模，其一次能源资源的消费处于世界排名中的第 28 位，其消费占世界一次资源消费总量的 0.6%。同时，英国石油公司估计，哈萨克斯坦国内一次能源资源的消耗量为 6000 万吨，相当于世界排名第 34 位。此外，哈萨克斯坦拥有大量的可再生能源，如水电、太阳能和风能，其中水力能源的潜力估计超过 1600 亿千瓦时。但是，化石燃料和某些类型的可再生能源（小河、风）的储备在哈萨克斯坦境内的分布非常不均匀。

由于燃料和能源平衡的紧张，解决确保国家能源安全问

题的需求目前变得非常重要，其中大部分是能源短缺的资源，设备的老化和越来越多的物理和过时设备，限制了燃料和能源综合体固定资产的重建和开发量。因此，所有这些都导致能源危机，而能源危机又会限制“国际社会能源安全”的石油和天然气出口，并与能力短缺、能源资源短缺、经济的高能源强度和财政资源的不足相关。

世界能源工业正在进行的全球化进程、各国能源综合体的相互渗透和互补、以及区域能源市场的统一，以上这些因素都导致人们越来越关注确保能源安全的问题。任何国家的经济安全的充分程度，以及国家安全的充分程度，将由其能源安全的水平决定。如今越来越明显的是，如果没有能源安全，就不可能确保能源的可持续生产或消费，而后者是任何社会经济体系生存、运作和发展的一个不可或缺的条件。因此，如果没有能源安全，无论花费多长时间，所有其他类型的安全都无法维持。

在现代世界，能源安全问

题正在成为一个严重的问题，
因为以环保方式生产的可靠和
有保障的能源供应是现代经济
和谐发展的前提条件的基础。
工业领先国家认为，国家工业
的稳定能源供应是其经济可持
续发展和维持的基础。

编辑：何香凝



编辑团队



王星懿
执行主编



何香凝
研究助理



李泳诗
研究助理



伍杰辉
研究助理



王钰静
研究助理



许汶
研究助理



杨佳琦
校对编辑

《全球非传统安全观察》

本刊由中国非传统安全论坛秘书处、圣皮耶国际安全中心联合出版，旨在跟踪观察非传统安全议题下的社会资讯、政策动向和学界研究，为从事非传统安全领域的工作人员与研究人员提供时新、长久的信息渠道。

本出版物内容版权属于圣皮耶国际安全中心。转载、摘编请注明“来自圣皮耶国际安全中心”。如因作品内容和版权问题需要同圣皮耶国际安全中心联系者，请于 30 日内进行。



中国非传统安全论坛秘书处
圣皮耶国际安全中心

广州市越秀区环市东路 326 号亚洲国际
大酒店 1803 室

联系电话：
020-83870795